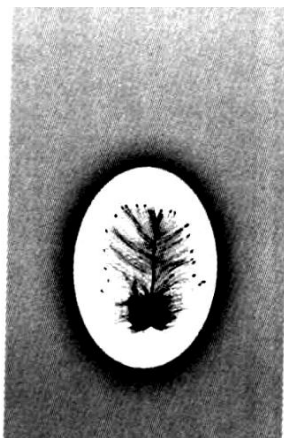


上编

语言学的 ABC 问题



写在前面

1990年我在北京推广表形码，那时全国的编码方案已达五六百个，因此觉得必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方案最好。我就去请教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里的专家。岂知专家们的答复是：“各有千秋。”回来一想，我觉得，这些人不是专家。我就再找汉字编码委员会主任郭冶方先生。郭先生与我因表形码的鉴定，曾一起相处过三四天。我说：“你们编码委员会里没有汉字编码的专家。”他一听，觉得奇怪。就问：“怎么说？”我说：“是专家，就应该能够知道评判编码的优劣。你们那里的专家却没有一个知道。”他又问：“如何才能知道评判编码的优劣？”我说：“汉字编码是相互参照发展起来的。谁能说出它的发展的过程，就能知道编码的优劣。”他问：“有论文吗？”我说：“没有资料。”他即送给我一大箱资料，有三次国际学术论文集和一百多个方案。我花了三年时间，写成《汉字字形编码方案的发展轨迹》《汉字字形编码方案的突破和结构》。这两篇文章，1993年发表于《教育研究》第8、9两期。如果没有郭冶方先生的无私支持，就没有我的这些成就。

友人郑松兴先生将它送给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郭振有先生。郭先生写了一份按语说：“立论严谨，言之成理，继续研究下去，直臻成功，乃是一件于民族、于后代，功德无量的事业。”这个按语，一直鼓励和鞭策着我。后来，我又去见我国科学学的创始

人赵红洲教授。他说：“老潘，你的文章，已经可见到编码的研究已处在前科学的阶段了。如继续研究下去，必有重大收获。”我就更有信心了。

1993年，我得到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支持，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持“汉字形码方案研究”课题，一年时间，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如《汉字形码方案的系统性》《汉字编码方案的设计思想》《汉字编码基本单元的命名》《汉字编码不应授予专利权》《汉字形码方案的得与失》《计算机应用将导致一场汉字革命》等等。这些文章都有发人之未发之处。1994年初，我又给国家教委写了一篇《汉字编码方向论》，郭振有先生题了按语：“请柳斌同志阅示。潘德孚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柳斌阅后，也说：“有见解。但此事歧见纷呈，需组织专家多讨论几次，目前，拟不宜过早行政干预。”我当然希望专家讨论。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见讨论会的影子。我是温州市的个体中医，靠自己开诊所维生，不能长期呆在北京。1994年，我将研究材料整理为一册《汉字要走出编码时代》，交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就回家重操旧业。

回家后，觉得研究仍须继续。有巧遇到詹振权先生，他愿意帮助我继续操笔。1995年，我们共同写成《汉字部件简论》。这本小册子，对汉字部件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奠定了我们另一本著作——《汉字编码设计学》的基础。1997年11月，我们共同出版了《汉字编码设计学》。我认为，此书建立起一门新的学科，可以为统一全国编码做出贡献。

1980年始，语文学术控制已有些松动。语文界出现了《汉字文化》杂志，这是与拼音化派唱对台戏的另一派。我静静地观察和研究这些争论。1996年我收到一份《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的小册子，阅后觉得这里面的气味越来越不对，大多数文章都像文革时代红卫兵的檄文，带头签名的竟然都是语言学界的著名人

士。他们对当前最为重要、最为头痛的字形编码研究不感兴趣，而热衷于意气争斗。

所谓汉字编码,主体是汉字,客体是编码。因此,汉字编码的研究主要是汉字的研究,本就是语言学界的事。可是他们却不闻不问。原来他们认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早晚要改革成为拼音的文字,没有研究它的必要了。《汉字文化》却认为汉字是一种优越的文字,唱起了赞歌,引来了他们的恼怒。争论逐渐升级,就上升为反伪科学的签名活动。问题是这些人都不年轻,都是教授、研究员了,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表演。原来这些表演,有它的历史渊源,不是某些人的‘创举’。我觉得有必要再研究一下文字改革。根据《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记述,1957年文字改革学术讨论会,对拉拼稍有不同意见的,都被说为反对文字改革而后果难堪。持权倚势弄惯了的一帮子人,现仅只能以纸笔相侮,对他们来说,也算是勉为其难了。

汉字拉拼化只不过是一种实践方法,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一些人因此成为专家或研究员或教授,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之故。我的这个讲法,一定会有许多人不满意,那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认为,有学术价值的必须是理论上有创新,能够形成系统,并带来新的概念,同时还要被实践所证实。汉字拉拼化只是一个方案,是某些人的臆想的产物,经半个世纪的实践,在学术界,主张拉丁化的,消灭了所有的反对派,任一家独言,又倾一个国家政权之力,仍然无法得到验证。学术堕落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我本来觉得自己的研究任务已经完成,不必要再搞下去了。见苏培成先生发表的《科学地看待汉字》后,手又痒痒地,因此又写了《〈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想不到雨立先生会发表这样的文章。我重新思考:“我国的语言学界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于是就有了里面的这些论述。我写文章总是要求说清每一个已经提到的概念，并要求使之系统化。

文字有形、音、义三相。历史上，音的研究称为音韵学，义的研究叫训诂学，缺乏的是形的研究。其实，只有字形才是字的根本。说汉字难学，是汉字字形难学。要改革汉字，改革的对象也是汉字字形，例如我的姓“潘”，要改革成“pan”。现在研制汉字字形编码，搞汉字拆分，拆分的也是汉字的字形。有人就认为研究它没有必要了。我现在通过编码研究，对汉字字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如果还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希望读者提出质疑。

本书上册议论语言学 ABC，即基本原理、常识，都是与我的研究有关系的问题。纯语言的问题我不敢涉及，因为我根本不懂，太外行了，也不需要。我们的语言学家，搬进西方的语言学，没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术上的死搬硬套，到头来还是害苦了自己。如果笔者所议论的能够为学术界的有识者所接受，看来我国的语言学，或者其“直系”“旁系”的有关“亲属”，都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应该改写。总而言之，汉文字学，决不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而必须是完全独立的文字学。

汉文字学的形、音、义三条腿，只撑起两条，站不稳。现在添加了系统的字形研究，就站得牢靠了，就不会再受语言学家们的“欺侮”了。

1999 年我在《汉字文化》上发表了《〈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后，雨立先生曾对我这么说：“还是从语言学 ABC 学起吧。”后来看伍铁平教授的《语言和文化论文集》，也有好几处对被他批评的人这么说。看起来，语言学家似乎都想拿这些 ABC 欺侮人。

什么是语言学的 ABC？就是指它的一些基本常识。所谓常识，就是最普通的知识。由语言学家们以最简要、最明洁、最普通

的方法进行普及的语言学知识。于是，使得这些知识“人人皆知”，变成了常识。

一门学问中的某些基本概念，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常识。如果这些常识基本上是错的，那就害人匪浅。在日心说出来之前，地心说是常识，当时的教会就拿这些常识火烧了布鲁诺。一个人从无知，到有知，到能够利用学来的知识进行工作或研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如果学来的都是错误的常识，他带上这些“常识”工作或研究，不仅终生做无效劳动，还会给社会造成损害。

是人，就有这么一个弱点 先人为主。作为常识，就会有许多人传诵。我们没有学习，也会从别人口中传过来。如果这种常识是错的，有人为之驳正，不管有无道理，首先被怀疑的不是这些“常识”，而是对它的驳正。但是，这决不是坏事。

我的这个小册子，主角是三篇文章 第一篇讲起源，第二篇讲规律，第三篇讲常识。由于分篇写成，其中不免有重复，希望读者谅解。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就看过联合国的官员吴文超先生的一些文章，说语言先于文字，我就有些反感。我认为这个讲法在开启无意义的‘鸡先蛋先’之争，当时就想写文章反驳。后来觉得既然无意义，就免写，省得落入圈套。“语言先于文字”这个论点，有很明显的逻辑错误。可是我问过不少人，从大学教授到一般教师，只要识几个字的，都说这么讲没有错，不仅‘人人皆知’，而且是人人颌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要求自己写的文章，对每一个概念都认真思考，要使自己的东西经得起质疑。1999 年我发表《〈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2000 年得到雨立先生的反驳，觉得‘语言先于文字’之论被演绎得越来越荒谬了，故写成《汉语汉字的起源》，以正视听。

《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也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写好的,投稿多处无从发表。后来到上海开‘书同文’学术研讨会被发表在《书同文论文集》的第二辑里。此文从大时空的角度展示汉字的发展规律,实质是对汉字拼音化的否定,当然也同时否定了周有光先生的《文字改革概论》。想不到苏培成先生会大光其火,并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简报》上发表公开信,说我无知。更想不到上海‘书同文’研讨会的发起人周胜鸿先生会回给苏先生一封如此低三下四的回信。我这个小册子也把这些争论附带一起发表。我希望读者不要认为这是没有意思的个人意见,其实质是一个为人为学的重要问题。

《中国需要自己的汉语言学——语言学 ABC 问题》这篇文章,是今年年初完成的。雨立先生的文章最后一段说:“如果这位会长还不明白的话,我们请他认真读一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有关‘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论述,从语言学的 ABC 老老实实学起。不要连一些基本概念都还没有弄清楚,就急着发文章,指手划脚,哗众取宠,混淆读者视听,扰乱语言学界的正常学术研究。”后来又看了伍铁平教授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有好多处重复说人犯‘常识性错误’和要别人“从语言学的 ABC 学起”之说,不能不让人觉得这里面的语气之厉,更让人感到他们在借“ABC”伤人。

我确实没有读过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不过,我从语言学家的一些论述中知道,连索绪尔自己也还没有把‘符号’和‘信号’两个概念弄清楚。所以,他才会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天下哪有用符号来记录符号的。翻看《汉字符号学》,里面把听觉、嗅觉、味觉也都说成符号,让人感觉不对味。再查《现代汉语词典》,里面虽然没有明白的解释,但却可从中领会两者的根本区别。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语言学中最为普及的“ABC”了。1999年我在《〈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中用了一小节提这个问题，并提出以“文字是传递和记录信息的书面符号”来替代。但写得不多。2002年我在《汉语汉字的起源》一文的最后一节论述在这个定义里采用‘信息’两字的原因，并以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来证明用我给出的定义的正确性。像文字定义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很难一次到位的。这三篇文章虽都有论及，实际也是向读者展示我的思考历程。文字定义是某些语言学家主张汉字拼音化仗持的资本。问题是科学容不得丝毫虚假。所以，尽管它已经成为‘常识’，现实却不买它的账——汉语拼音永远取代不了汉字。几代的努力等于白费。

苏培成先生在公开信中认为，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与汉字“书同文”没有关系。这种思想，代表的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急功近利。看汉字拼音化，自卢戡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到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字母方案》，一个世纪以来，汉字拼音化只有方案，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周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中谈规律不过三言两语，也不是正式的研究。五六千年的文化，称之为汉字文化。这个文化，是由在这五六千年中的汉民族的所有生命积累起来的。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汉字文化中人。自小至大，自出生至死亡，都在汉字文化之中，人人离不开汉字。所有说汉字不好，说汉字落后的人，同样离不开汉字。你们鼓吹甩掉汉字，又自生至死使用着汉字，多么难堪 这是什么原因 不重视规律研究之故也。

人生苦短。每一个搞学术的人，都想在有生之年在自己的工作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到头来却发现白忙了一辈子，那将多么尴尬。我认为，学术上的犯错，随便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能犯在概念上。有时一个概念错了，就糟蹋了几代人。例如‘文字

改革”，让一个学术界的几代人以及它的权威们，都成为历史的笑料。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根，在发展，在演变。汉字已经活了五六千年，还会继续活下去，所以不能‘改革’，而是在‘变革’。今后它将如何活法，我们的生命太短，谁也不能预料。

我希望看这些文章的朋友，都能给我提出问题来。书名为“改错”，当然不想越改越错。

当前语文学术上的一些问题之我见

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拿哲学来说，它发展的动力在于怀疑和批判，……正是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

—— 摘自《朱学勤文选》93页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19期通讯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在台湾出版的《古今艺文》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999年8月出版)上发表论文，题目是“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副标题是“评徐德江的所作所为”。文章从八个方面分析了徐德江伪科学的特征：(1)要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7)使用生造的术语和概念故弄玄虚，欺世盗名。……

学术争论如果只允许有一种声音，那么它就非衰落不可。衰落的标志是什么？是幼稚化。正如龙应台所说：“文化是一条滚滚大河，里头的主流、支流、逆流和漩涡彼此冲激撞击才造成河流的面貌。只有一潭死水是没有逆流的，只有死了的文化是没有逆向思维的”^①。我认为，伍铁平、徐德江之争使我觉得语文的学术

文章在幼稚化 同时,还觉得其中蕴含着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就是学术研究应该独尊一术呢或是百花齐放?谁在压制学术进步,我们应深究其原因。

独尊一术的语文学术传统

据《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472~474页)载,1957年,文改会召开文字改革学术座谈会,到会的专家当然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人物。唐兰、陈梦家、陶坤等提出了与主流派稍许不同的改革意见,但与会者“大部分人不赞成陶坤、陈梦家等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见”。但是这次争论,一开始就采取批判和围攻的方式,是不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的。正是在那样的气氛下,有些理论问题至今仍显得比较薄弱,自然难以使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和一些规划、作法都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陶、陈等后来都成了右派,他们再也不能继续研究,文章也无从发表,研究也就后继乏人。百家争鸣就成了一家独鸣,汹涌奔腾的大河就变成了一潭死水。语文学术的走样就由此而始。这当然是时代的关系。这个记述,反映出许多问题:

(一)唐兰是主张汉字要改革的,就是说,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在方法方式上有不同的意见。唐兰认为文字体系只能“逐渐过渡”(这就是笔者认为文字发展的渐变性,不是你说要变它就能马上变化的),主流派则认为能够“整套地改革”。唐兰认为文字用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他们的思想,而不仅仅为的是写语言(这就是笔者认为文字以其形体直接记录或传递信息的意思)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 文字‘不是语言的复制品’”。主流派则认为“文字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

(二)陶坤认为汉字改革的‘理由均不充足’;一是‘汉字难认不是改革的理由’,因为汉字由字组成词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字,就可以认识多数的词,并不比拼音文字难认;二是‘汉字难写也不是理由’,因为有些字比英文要好写得更多;三是‘汉字难打字,甚至于难打电报,难用电子翻译机等,这些理由更不成为其理由’,因为要求文字适合机械而不求改良机械来适应文字,这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的行为。‘如果把文字单纯地看成是记录语言的工具,那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陈梦家也认为:“文字要改进,不要改革”。主流派则认为汉字难学,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发达的新社会的要求,因而需要改革。

(三)唐兰、陶坤这些话,我们现在想想,讲得都很有道理。即使没有什么道理,也都是就事论事,然而,为什么会受到围攻呢?而且,参与围攻者并非是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粗俗之辈,而都是全国赫赫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也都是现在主流派的授业人。围攻,当然就是斗争。隔代了是否就没有关系了?当然不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行为方式等等,都同样会传承给下一代,最直接者就是他们的学说接班人。这就叫做文化传统。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语文界主流派现在的一些做法没有摆脱原来的不良传统。

(四)改革开放至今已多少年了,我认为主流派仍一门心思坚守“独尊一术”——汉字拉丁化,容不得别家争鸣。因为文革结束后,各界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一些反思,而语言文字的学术性较强,而又早已一派独统,没有对立面了,反思的精神就透不进去,老传统、老作风就很难改变。袁晓园、徐德江原来都是拼音化的信徒,在实践中悟得此路不通,就从这个阵营里‘杀’了出来。对于这些文改‘叛徒’,素有‘批判和围攻’斗争传统的主流派当然不肯罢休。伍徐之争实质就是1957年对唐兰、陶坤、陈梦家斗

争会的延续，是一场要独鸣或要争鸣的学术态度的是非之争。

(五)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历次发表的一些《简讯》中可以看出 语文界主流派不仅没有从斗争哲学中摆脱出,也没有从一言堂的思考模式中摆脱出来。否则,就不会产生那个声讨伪科学的《特辑》。人们已经从斗争哲学里吃够了苦头,不再相信它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了。何清涟说得好:‘与一位伟人的预言不同的是,世界没有‘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螺旋式前进’,而只是在斗争中逐渐坍塌,包括他自己苦心铸就的辉煌。可悲的是我们至今还深受其斗争哲学的影响,以为在斗争中可以求前进。不少人一看到别人的成就,不是去发现其原创性与独特的新解释,而是睁大眼睛挑毛病,然后再洋洋万言地‘批评’‘商榷’一番’^②。此说确实点中了某些热衷于‘声讨伪科学’学者们的要害。

(六)学术进步之根本就是依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派学说互相切磋。所谓切磋,不是批判,不是说别家是伪科学,而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摆出来 不是说别家‘使用生造的术语和概念故弄玄虚’,而是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研究这些由他们提出来的新概念,对在哪里,不对在哪里。汉字拉丁化还只是一术,成不了一家,能囊括所有语文学术的概念吗 任何学科的突破,首在建立新的概念。某大学有位副研究员给我来信说“《文改之声》有近乎人身攻击的批徐德江文,我曾写信给编辑部,不搞批判。徐终于出了高级文章《汉字与普通语言学》,更加振奋人心”可见,有人说是‘生造术语和概念’,有人则认为是‘振奋人心’的‘高级文章’。我虽然不懂普通语言学,不能判断它的好坏,但我却能够判断对待它的态度的是非,对学术研究有利或是不利。现在语文界很多人说徐德江的坏话,但有人说好的。科学这个东西,是非不能依人数的多少来决定。那种签名活动,用投票方式解决科学真伪的方法是极其错误的。

(七)“有些理论问题’不是‘至今仍显得比较薄弱’;而是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因为,汉字拉丁化只是一种实践的设想,而理论建设必须通过多种实践的比较,才能从中归纳出理论来。而今拉丁化派唯我独尊,排斥任何其他设想的可能,怎么能建立理论?半个世纪以来,主张拉丁化的学者们只在索绪尔的屁股后转来转去,没有自己的创见。自己没有创见当然不能强求,为什么不准徐德江“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科学是人类世代代以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有限认识能力,去探究,去探知无限的外在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科学又总是以后人不断发现前人认识中的缺陷、不足、错误,并予以修正、补充,乃至推翻其错误结论而前进,而发展的”^③。

二、概念错误及其原因

我自研究汉字以来,发现语文界有不少概念错误。

拿《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这本书来讲。书是王均先生主编的,撰写者也都是语文界有名望的人。这一本厚达 870 页的书,却没有把‘文字改革’这四个字讲清楚。搞语文的专家没有把语言文字搞清楚,岂不成了世界级的笑话?其实,这不足为怪。(20 世纪本身就是一个糊涂的世纪,我们也只能‘难得糊涂’,不过千万不要在概念上糊涂。)就因为有了语言文字交换信息,人类社会才得以形成。也就是说,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人类社会。所以,笑话总是不断地从语言文字中发生的。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记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字改革的实况。这本书总共只讲四件事(一)确定拼音字母表;(二)确定简化汉字表;(三)推广普通话;(四)注音识字。我的看法是 其

一,确定拼音字母表是为统一全国语音,使之标准规范,与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没有一点关系。如果说它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 汉字拼音化,那当然算。问题在于汉字拼音化根本还没有一点眉目,就把确定拼音字母表讲作文字改革,也未免太“扩大化”了。其二,确定简化汉字表算不算文字改革,那要看它的内容。我认为,文字改革应该是体系性的。比如说我姓潘,但是我用泮来替代,潘德孚就写成了泮德孚,算不算文字改革 当然不能算。这个比方,与汉字简化相比,自然相差太大,似乎不大恰当。不过,它能给我们一个启示 汉字改革应该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是指体系性的改变,例如汉字拼音化 狭义的,则如汉字简化。其三,推广普通话算不算文字改革 当然更不能算。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统一全国语音,有利于信息交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音的国家,统一语音能促进文化交流和生产发展。如果把推普讲成是文字改革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把汉字改革为拼音文字。可以认为,文革结束后,汉字拼音化已走上绝路。因为,它的思想基础——极左——没有了。从 50 年代至文革结束,极左思潮已经从高峰跌至低谷。汉字拼音化本就基于极左(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 1931 年海参崴的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的十三原则),现在它虽已失去了政治的思想依托,但其学术专业的一面却能掩护它继续存在。其四,注音识字则属于教育方面的实践,目的是提高识字速度(是否能,则是另外一回事)和有利普通话的推广。如果把注音识字也算做文字改革,那必须以汉字拼音化为前提。否则,注音识字只能算一种教育方法的研究,怎么算文字改革呢?一本这么厚的书,又由好多的语文教授来编写,其结果是文章离题,事实证明语文学术在幼稚化。

有人说,认为汉字不能改革是错误的。因为,自古至今,汉字一直在演变,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它已经面目全非了。用历史

来证明汉字能够改革,那很好,试问,自古至今,哪一代,哪些人,曾经改革过汉字 把变革当成了改革,用汉字的自动演变,来证明汉字一定能够改革(成拼音文字),岂不是笑话 改革指以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使汉字按照指定的方向演变。问题在于使汉字发生演变的人是所有的汉字使用者,即是说是整个汉民族,而不是几个少数的主张文字改革的专家。变革是指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中,由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汉字的使用者为使汉字更好地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逐个改进汉字的形体,使之更适合应用,久而久之,逐渐积累,直至发生体系性的改变。文字是全社会传递信息的工具,就是说,它的改变,需要全社会的公认,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乱改的。从某个人发现某个字如何改进更有利使用,逐步扩展到全社会公认,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约定俗成的过程。违背约定俗成规律的文字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一般人的寿命所能企及的。所以,文字的演变只能叫做变革,而不能叫做改革。

把变革误读为改革,其原因如前所述,语文学术缺乏宏观的、时空的方法论的研究,精力过分注重于实用。从卢戡章搞出《一目了然初阶》始,到汉字拼音字母方案终,文字改革的研究都是从方案到方案,宏观的、大时空的纯理论几乎没有。我们的做法几乎都是实践再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错误,以新的实践来修正,从不做无功利的纯理论研究。这当然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概念错误,只能通过理论研究才能纠正,否则,就会越走越远。例如不准“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就是一个标志。远到这样荒谬的程度,就会使自己成了伪科学。王富仁说:“科学是赋予各种文化概念以确定性理解的一种形式,没有科学,就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概念,就没有具体的真理形式,一切的文化概念都将是游移不定的,一切的真理都没有相对确